

“互联网+”助力宁波扬帆再起航

主持人：李磊明

嘉宾：孙建红（宁波大学商学院教授）

钱斌华（市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董明荣（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互联网+发展的全过程,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宁波抢占“互联网+”高地,可以重点从“互联网+服务”“互联网+产业”和“互联网+城市”三方面入手。

一、互联网+服务

一是要提升发展电子商务。深入实施“电商换市”,全面实施电商“七进”工程,加快发展农村网购,引导网商实现公司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做大做强大宗商品电商交易平台、行业平台和同城购物平台,构建宁波特色的电子商务产业链。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将宁波打造成为全国主要的进口快速消费品物流集散中心和电子商务出口基地,实现电子商务企业办公、仓储、物流的集中运作,形成一体化的跨境电商服务产业链。

二是要完善智慧物流体系。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战略部署,加快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建设,按照“港口经济圈”的战略构想,建立江海陆联运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和宁波港物流贸易信息平台,发展智能货运车辆,实现货运电子路单,推动多式联运生产,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下的运输协同调度平台化。

三是要进一步做好智慧健康保障。要充分利用移动医疗技术,加快推进“云医院”建设,通过O2O运营模式,实现健康管理在个人、家庭、社区和医院等环节的闭环管理。推进智慧健康档案大数据挖掘,探索医疗卫生大数据研究,为深化医改提供决策支撑。开展居家养老、疾病看护、个性化健康管理等健康管理信息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市民健康服务,拓展健康信息服务新业态。

四是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宁波要大胆创新金融服务的业务模式、机制、流程和产品,鼓励互联网企业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展广泛合作,推进产业链融资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产品创新,在移动支付、移动信贷、移动征信查询等领域大胆突破,促进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等新业态实现健康发展。

二、互联网+产业

一是做大做强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要立足于宁波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已有优势,大力发展嵌入式软件、工程软件、工业设计软件、自动化应用软件,积极研发石油化工、电力应用、港口物流等行业软件,加大软硬件交互设计力度,拓展应用软件领域,向平台软件、基础软件领域延伸。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软件产品,加快软件向网络化、服务化纵深发展。加快软件在政府治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和其它领域的应用。加大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聚地的建设力度,依托软件园等特色园区及基地,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创新研发体系,形成以龙头企业拉动的产业生态集群。

二是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加快培育完善电子产品制造产业链,打造电子信息产品的智能制造、体验式营销,形成涵盖设计、研发、制造、营销的全产业链。提升家电、电子测量仪器、电子机电、广播电视设备等现有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市在半导体硅材料、引线框架、溅射靶材等基础材料的优势,打造IC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的价值链,形成整体竞争优势。

三是重视发展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互联网+”,信息安全不可或缺。宁波要加快整合全市各部门力量,设计安全、可控的信息资

源开发、开放和共享模式,做到数据使用的可追溯和可查询。发展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咨询、信息系统安全方案设计咨询、信息安全工程实施、信息系统安全集成、运维、应急、数据与系统容灾备份、信息安全测评、认证、培训等信息安全服务,推进技术、产业和机制保障。

四是加快智能产品研发和制造。加快促进“宁波制造”向“宁波智造”的转变,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的智能产品研发模式,促进企业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支持本地企业联合国内外互联网企业,加快在传感器、芯片设计、信息处理等领域的产品研发和推广,提高汽车电子、医疗电子、智能手机、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等产品的智能化水平。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我市企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加快深度感知、智能决策和自动执行功能的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研发和生产。

五是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发展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从生产型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支持制造业增加服务环节投入、再造业务流程,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融资租赁、网络精准营销、全生命周期管理及在线支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工程总承包和供应链管理、服务外包等商业模式。

三、互联网+城市

一是提升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在现有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基础上,宁波需要进一步建设高速覆盖的宽带和无线网络,着力推进下一代宽带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城市WIFI的建设,统筹推进骨干网、城域网和接入网建设,提升网络容量和智能调度能力。在5G技术成熟时,争取成为国家首批5G网络商用城市。进一步推进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建设,所有部门应用要逐步向政务云计算中心实现云迁移,逐步实现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和数据资源共享与开放,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整合,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公众参与度。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进行大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为城市精准运营、科学管理和高效服务提供支撑。

二是拓展智慧民生服务。面向民生服务,是宁波智慧城市建设的立足点,前期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接下来的“互联网+”发展浪潮中,宁波需要进一步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改善和提高民生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重点推动我市的智慧文化、智慧旅游、智慧社区、智慧水务、智慧就业等智慧应用体系建设,以全天候高效对接、个性化主动推送为特征,让信息化在文化服务均等化、旅游服务、社区家庭、应用、“五水共治”、个性化就业等领域深入应用,实现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

三是激发信息消费需求。积极推进我市的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国家信息惠民示范城市建设,以拓展信息消费产品、提升信息消费服务为抓手,广泛宣传、激发政府、公众的信息消费需求,实现信息“互联网+”在市民的健康持续发展。

多方合力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

董明荣：“互联网+”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体制突破、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技术创新和模式推广等各个环节,必须强化

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积极性,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加快推进我市“互联网+”发展,形成全方位统筹、宽领域整合、深层次联动的工作格局。

一是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相结合。政府要在科学规划、政策引领、要素保障、统筹协调、舆论宣传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各级各部门要把推进“互联网+”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事项,列入“十三五”发展的重点内容,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国际先进经验和行业发展前沿,结合部门和区域实际,进一步理清“互联网+”发展的目标思路、路径方向、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和利益导向机制,激发市场主体参与“互联网+”发展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财税政策、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基金等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互联网+”相关领域倾斜。

二是要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相结合。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服务和管理能力,研究制定适合宁波的“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积极推进“互联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平台构建、政策完善、体制突破。要立足宁波发展实际,分步实施,量力而行,因地制宜,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重点领域、特色领域、急需领域,找准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寻求突破,充分发挥宁波在工业制造、港口物流、民营经济、城市管理等领域的基础优势,在重大平台、重点企业先行先试,力争成为全国示范。

三是要技术引领、人才支撑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龙头企业带动、科研院所支撑,有利于重大突破的“互联网+”技术创新体系,探索建立宁波“互联网+”协同创新联盟,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工业设计供需对接平台和各类“互联网+”创新孵化器,着力推动在智能制造、芯片制造、信息软件、大数据开发应用、物联网等领域形成技术突破。构建“互联网+”人才综合开发体系,面向市民普及培训信息技能,面向专业领域实施“互联网+”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支持宁波企业和高校联合共建实训基地,鼓励在甬高校加强“互联网+”相关领域学科建设,支持开设“互联网+”人才定向委培,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制定出台针对“互联网+”人才和人才队伍的专项人才计划。

四是要政策创新、体制突破相结合。积极对接和及时落实国家有关“互联网+”的政策措施,制定出台宁波发展“互联网+”的纲领性文件,整合梳理现有政策,加大在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金融和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领域的政策创新力度,完善“互联网+”相关地方立法,配套政策和制度规范。着重在信息共享、信用体系建设、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 and 行政审批等重点领域,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着力完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制度,破除“信息孤岛”现象;建设全市市场主体综合诚信数据库,健全统一规范的诚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互联网+”领域重大科技发明、版权、著作权、品牌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健全信息安全保护机制,加大对违规使用相关信息的处罚力度。

五是要基础完善、开放合作相结合。加快推进“智慧宁波”建设,继续实施“宽带中国”专项行动、无线城市 and 三网融合工程,不断扩大光网覆盖范围,适应重点行业融合创新发展需求,完善无线传感网、行业云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试点建设宁波市级大数据服务中心、跨境电商大数据资源中心等,大力提升“互联网+”的基础支撑能力,加快建设一批有助于推动互联网与产业升级、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生活消费相结合并创新的公共平台,建设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产业园区、众创空间。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国、全球范围内吸引汇聚各类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高端要素,支持和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宁波互联网企业拓展海外用户,推出适合不同市场文化的产品和服务,并积极探索走出去与国内外实力型知名企业、机构和组织开展战略合作,形成资源集聚效应、联动效应。

相关链接

全球视野下的互联网经济新动态

美国:逐步迈向“万物智能”

互联网早已成为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发布的一份互联网调查报告,有84%的美国成年受访者表示生活中离不开互联网,而15年前,这一数据仅为52%。报告说,受过大学教育、年收入超过7.5万美元的城市居民更易依赖于互联网,同时18至29岁的年轻族群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最高,特别是亚裔和白种人,比例分别高达97%和85%。报告也发现,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已从去年2000年的14%飙升至2015年的58%。

那么,美国人如何看待互联网的未来?有学者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世界正从“万物互联”逐步迈向“万物智能”。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每日早晨,家里的咖啡机会自动煮好咖啡;没有牛奶,冰箱会自动订购;出门时,汽车已在门口等候,并设定好自动驾驶的目的地。当然,只有科技界切实做好到技术共享,打破企业与国家的界限,上述景象才有可能更快变为现实。

英国:护航网络金融发展

全球第一家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P2P)佐帕(Zopa)2005年诞生于英国,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万用户,实现累积贷款超9.7亿英镑。英国P2P金融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英国P2P信贷平台新增借贷额5亿英镑,实现累计贷款总额超26.4亿英镑,英国互联网金融市场规模相较于2013年增长了近3倍。

2011年,英国最大的7家互联网金融企业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P2P金融协会,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起到了引导和规范作用。在行业自律的基础上,2013年,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首先发布了《关于众筹平台和其他相似活动的规范行为征求意见稿》,对规范众筹行为提出了若干监管意见。FCA在2014年3月又发布了《关于网络众筹和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不易变现证券的监管规则》,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从法律法规的层面加强了监管力度。

韩国:开掘“21世纪的原油”

发展互联网,韩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意识到信息产业蕴藏巨大潜力,韩国对网络进行了“超前的”规划和投入。1995年韩国开始了长达10年的国家宽带设施建设,实现非宽带接入的基本普及。政府还先后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用于建设光纤主干线网络。此外,对于网络运营商,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对于民众,政府则在政策上为低收入人群创造有利条件,鼓励老百姓积极“触网”。有数据统计,在韩国,宽带覆盖率高达97%。韩国人还是忠实的数字消费者,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竞赛就诞生于韩国。

韩国总统朴槿惠指出,发达国家正在发展大数据产业,以应对经济低迷。大数据可谓“21世纪的原油”,是用创意创造附加值和就业岗位、创造经济新资本。2013年2月,韩国政府提出要发展“创造经济”,以创造力为基础,通过科学技术、信息通信技术,与民众创意相结合,转换为实际生产力。当“创造经济”遇上“互联网+”,一场互联网行业的创业风暴正在韩国席卷开来。

印度:推进产业化有瓶颈

印度网络和手机协会年初发布的报告宣称,2013年,印度互联网产业的市场规模为36万亿美元(1美元约合63.7卢比),约占国内生产总值3.2%,2018年将增长到100万亿美元,预计占国内生产总值5%。印度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将由2013年的17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750亿美元。截至2014年12月,全印的网络用户已达3亿,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三,再过3年将会达到5.8亿。

网民数量的迅速增长带动了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兴起,本土电商从无到有迅速崛起,国外电商极力挤入或跃跃欲试,共同撑起印度互联网的蓝天。但印度的现实经济条件和软硬件环境也制约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印度目前网络覆盖率位列全球第142位,宽带普及率位列全球第125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窄带国家,大部分人都用不起宽带,尽管全印已有3亿网民,全印的宽带用户却只有8500万;国内道路等基础设施欠账太多,严重制约了物流产业的发展,也成为电商发展的巨大短板。

(李伦)

理论圆桌

主持人:

我们正迎来一个“互联网+”的变革时代。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已具备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的规模优势和应用优势,制定和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不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领域,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网络基础和支撑,还是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

今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7月4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围绕转型升级任务迫切、融合创新特点明显、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提出了11个具体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宁波该怎样发挥比较优势,多方位、多措并举,站在“互联网+”风口,抢占“互联网+”高地?本期“理论圆桌”,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互联网+”,加出来的红利关联你我他

孙建红:“互联网+”已成为不折不扣的热词,各行各业、各级政府部门都要拿出更具体的落实方案,让“互联网+”真正融入民众的生活、创业,发挥出巨大的发展红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

首先,互联网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国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但我国互联网经济,尤其是电子商务却逆势增长,已成为我国经济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动力。

其次,信息已经成为各行各业重要的生产要素。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已不再是简单替代和颠覆,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以生产要素的形式与传统产业融合,并进行改造。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技术就如引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和电力一样,将重构所有行业和产业。

最后,互联网已经融入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使用互联网购物,通过互联网与他人沟通,利用互联网获取生活信息等,可以说,互联网已经关乎你我他的生活。从信息的获取和传播,到社交的方式与范围、与外部世界沟通,再到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都在迅速地互联网化。十年前,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报刊广电等传统媒体,而现在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甚至自己就可以成为所谓的“自媒体”;十年前,人们还主要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与他人联系,而现在的微信、微博已经极大拓宽了人们的社交圈;十年前,超市、百货公司还是我们主要的购物场所,而现在可以在网上买到所有在实体店可以买到的商品。互联网之所以能带来这么多变化,核心在于它对效率的提升,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更快捷、更方便地生活。

重点突破抢占“互联网+”高地

钱斌华:“互联网+”包罗万象,可以入手的领域和行业很多,但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是有限的,要以有限的资金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效益产出,就需要把绩效管理的理念贯穿于宁波“互

实践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城乡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创新城乡社区治理是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和要求,宁波经过积极实践和不断探索,推进城乡社区规划建设,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制,走出了一条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社区治理新路子,为推进我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提供了有益的基层经验。

一、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进社区规划建设

城乡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基础和保障。我市历来重视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一直作为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重点来谋划推进社区建构。市委定期召开县(市)区、乡镇(街道)书记座谈会,听取基层建设情况汇报,营造大抓基层建设的导向和氛围。坚持规划引领、科学推进,近年来编制了《宁波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划纲要》《宁波市城市社区布局规划》和《宁波市农村社区建设布局规划》,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全面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推动城乡社区工作走上科学化轨道。为了加强和规范社区工作,确保社区职能回归,我市全面实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率先建立群众评议社区和社区评议部门工作的“双评议”制度,激发基层活力,改进政府作风,推动社区从

宁波城乡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

胡荣誉

“重行政事务”向“重为民服务”转变。2012年以来,通过清理整治社区“五多”问题,已取消社区41项盖章事项,砍掉70项代办事项,创建评比从53项减少到3项,纠正社区工作行政化倾向,推进社区“减负增效”。2014年,我市社区工作居民满意度达到90%,比前两年提升6个百分点。

二、完善社区治理结构,构建多元共治平台

创新城乡社区治理,关键是完善治理结构,搭建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平台。一方面,从规范基本架构入手,以区域化党建引领推动城乡社区组织重构,明确在社区(村)建立“一委一居一中心”的服务管理体制,形成以村(居)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居)委会为自治主体、便民服务中心承接事务的“三位一体”城乡社区治理基本架构,统筹各类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的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格局。另一方面,针对近年来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基础设施城镇化、服务管理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为标志的农村社区数量不断增加的特点,积极探索社区治理新模式。比如,北仑区打破传统城市街区、行政村界限和管理模式,将240个行政村和社区、10个工业园区统筹规划为83个新型社区,建立社区联合党委决策主导、社区协商议事组织统筹议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执行落实“三位一体”的新型社区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已建成运作70个。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来甬务工,我市创新流动人口社区化服务管理机制,在全市3896个外

来人口100人以上的村(社区),推广建立“和谐促进会”,搭建“以活动促交流、以服务促融合、参与促管理、以和谐促发展”的协商共治平台,促进新老宁波人和谐相处、城乡基层和谐善治。目前,全市已建成“和谐社区”463个。

三、健全居民自治机制,提高社区治理能力

在推进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我市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创新居民自治载体,不断完善党领导下的群众自治机制。为了让城乡居民依法有序参与社区治理,在城市全面推行社区居委会直选制度,全市85%的社区实行直选换届,居民参选率达91%;在农村重点推广“自荐直选”选举方式,全面实行竞职、履职、辞职“三承诺”制度。为了强化村(居)委会民主议事、民主管理的责任和能,总结推广宁海县等地的农村“小微权力”清单、象山县“村民说事、村务会商、民事村办、村民事评”为主要内容的“和村惠民四步法”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做法。为了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强化社区自治功能,海曙、鄞州等地健全居民会议、社区听证、民主恳谈等协商议事机制,制订修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在解决小区停车、“群租”问题、推动“三改一拆”等方面,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同时,以创建“平安社区”为载体,建立“社区居家警务室”,探索“网上枫桥经验”,组织群众参与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治安

防范等平安建设工作,做到问题早解决、矛盾不上交。我市各地通过居民自治破解小区停车、物业管理等社区治理难题,推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维护了基层平安稳定。

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方面,我市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体制改革,出台《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登记办法》《宁波市志愿服务条例》政策法规,设立社会组织专项发展基金500万元,建立以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区邻里中心”为平台的“孵化基地”,培育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壮大协同治理力量。全市注册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1.1万多个,平均每个社区17个,志愿者队伍85万人,涌现出“81890”“红蚂蚁”志愿服务队”等一大批社区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品牌。在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方面,出台《关于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探索建立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机制、社区社会组织公益项目创投制度,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承接政府部分事务性工作,促进社区服务、活跃社区文化、维护社区和谐。2013年以来,我市连续举行“百家民营企业、百个社会组织、百个公益项目”的“三百公益对接”活动,由政府搭台、“两新”组织携手出资出力,共同服务社会公益事业,承担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社会责任。近两

年,全市两级财政投入3000多万元,委托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延伸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管理项目1200个,基本满足养老助残、纠纷调解、特殊人群帮教等群众普遍关切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真正实现“花小钱,办大事”的目标。

五、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发挥社区治理效能

主动顺应群众新期待,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将注意力集中到提供服务和引导群众参与上来,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全市152个乡镇(街道)建立起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成社区(村)便民服务中心2774个,覆盖全市社区和94%以上行政村,把服务网络延伸到每个村(社区)、方便所有居民,基本实现生活、卫生、文化三个“十分钟服务圈”,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实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全市建成455个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推动法律服务下基层、进社区。发挥“基层和谐促进会”优势,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导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全市建立1.8万个管理网格,落实网格员3.4万人,组建服务团队2.8万支、18余万人,做到“管理到户、服务到人”。积极构建联系服务群众的新平台,在社区(村)建立“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社情民意接待站,推广“俞复玲365社区服务工作站”、谢家路村“小板凳”工作法,及时反映和协调社区居民多方面多层次利益诉求。把“走亲连心”活动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建立领导干部挂钩基层、联系群众的常态化机制和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认领“微心愿”等制度,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推动为居民解难题、办实事、做好事。2014年,全市在职党员到社区实施服务项目1.4万个,认领“微心愿”3.6万个,开展志愿服务14万人次。

(作者为市委政法委研究室主任)